

从方志文献看吉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寇旭华

[摘要]吉林省作为北线节点省份,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大量方志文献记载了吉林省与俄、日、朝、韩、蒙古等国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对吉林省“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与突破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吉林省;一带一路;地方志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最终版规划中,“一带一路”重点圈定了18个省,其中包括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吉林省位于“一带一路”东端的东北亚地区,所接壤或联系紧密地区除了幅员广大的俄罗斯,还有隔日本海的日本,韩国、朝鲜与蒙古国。从大量地方志文献中可看出,自古以来,吉林与这些国家的水路与陆路经济文化交流就极为频繁,对东北的社会民生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鉴与参考。

一、吉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往来

吉林省的“丝绸之路”贸易可谓历史久远,受地理、人文环境及地缘政治影响,经历了几个明显带有时代烙印的发展阶段。

1. 自由贸易阶段。早在唐代渤海国时期吉林就已经与日本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记载,从公元698—927年间,曾派使者34次,2000多人去日本的福井、石川,进行物资交换^①。当时海上交通相当发达,有“海上丝绸之路”之誉。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具体指挥春经盐州、摩阔崴(今苏联库拉斯基诺)抵达日本的航道,这条通道使中国与亚洲许多国家增强了经济文化交流。但此后由于元代吉林地区专注发展农牧业,明代着重边防,尤其是清政府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严重阻碍了吉林经济的发展。明末清初,吉林省以陆路贸易为主,清前期以吉林乌拉为中心形成了物资交流网络,不仅有城乡之间贸易,也与朝鲜和俄国在边境上开展互市贸易。在朝鲜咸境北道的会宁、庆源两地开市,交换马、牛、盐、白纸、农具等物品。到光绪年间,开放了龙井市和琿春市村镇的三处中朝贸易商埠。据《琿春市志》载,19世纪80年代,大批华人在海参崴经商,海参崴200余家店铺中有80%是

华人开设的⁽²⁾。

2. 被侵略和不平等商贸阶段。17世纪中叶,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其政治军事统治在世界舞台的全面落后,中国的广大领土和资源日益被列强所觊觎。俄国、日本相继加紧入侵的脚步。1689年7月,经过雅克萨反击战收复雅克萨城,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每年夏秋两季,满汉商人在吉林和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把农贸商品运往中俄边境,同阿穆尔河沿岸居民交换畜产品和海产品。“俄国商队以尼布楚为基地纷纷来中国贸易,从1698年开始到1718年的20年间,沙俄商队来中国有10次之多,人数也超过清政府规定,最多时达到800人”,而且“是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他们带来100卢布的货物,在中国就可换回6000卢布的货物。”⁽³⁾贪婪的侵略者并不满足,此后,在1858年中俄的《璦琿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加紧掠夺式贸易,“1868—1895年,沙俄经由敖德赛和海参崴两港从中国掠购的农副产品及原料价值就分别为4107万海关两和1372万海关两,同期经由上述两港销往中国的俄国商品价值也分别为420万海关两和416万海关两,占同期输入中国商品总值的41%”⁽⁴⁾。1907年后,珲春、龙井村等地相继开放为通商口岸。作为图们江入海口的珲春成为中俄、中朝贸易的交通枢纽,作为东北亚大陆的经济地缘战略要冲,珲春在吉林省的丝路经济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此外,长春的商贸优势也日益凸显,《长春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载,清末,辽

宁营口开港后,“东三省出产的农副产品沿辽河流域经营口港输往国外,国外工业品也自营口运往东北各地,长春地当要冲,恰在南北交接之处。”长春成为重要进出口商品集散地之一,是东北一大商业中心。当时长春的运货马车被国外商户称为“宽城子骡马大车队”⁽⁵⁾。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吉林省的大豆打进欧洲市场,作为重要油脂工业原料的世界性需求日增,也使帝国主义对吉林省的原材料掠夺和资本输出加剧。据编于民国年间的《长春商工人名录》载,1922年长春已有欧美商人40户,日本商人660户,占当时长春工商和金融业户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商户中以俄商居多。据日本人所著记载:“(1894年)从长春输于俄领黑龙江沿岸的商品有欧罗巴洲和亚美利加洲的制造品、朝鲜的低廉织物、马尼拉的卷烟、奥地利的洋火和洋酒等”⁽⁶⁾。1917年十月革命后,一批原俄国资产阶级流入长春开设店铺,如著名的秋林洋行,“不仅经营呢料、五金、化妆品、裘皮制品、毛毯、地毯、各种罐头、酒等中高档百货、食品的批发和零售,还附设制茶部和火腿肠加工部,是当时长春最大的百货店”⁽⁷⁾。

日俄战后,根据1905年不平等的《中日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条约》,日本取代俄国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吉林。日本商人分布在全市商业、工业、交通运输、金融等各个领域。1920年后,苏联边境封锁,中苏边民贸易中断,日货大量倾入,民族商业逐年减少。1926年以后,日本人陆续在长春投资

开设一些企业,“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在长春直接投资额约3981.2万日元,实收约3392.4万日元,其中开设的各种会社71户(不包括支店和出张所)⁽⁸⁾”。在沦陷时期,吉林省的经济命脉则完全被日本侵略势力操纵,本民族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难以生存和立足。《珲春市志》载,沦陷时期珲春商品紧缺,绝大部分商铺倒闭。

3. 迎接解放的战时贸易阶段。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日伪势力陆续逃离东北,吉林省的对外贸易也随之进入新政权成立前的过渡阶段。中共吉林省委从解放战争和人民生活需要出发,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领导解放区人民克服缺吃少穿的困难。据《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记载,1947-1949年,东北解放区对苏联、朝鲜和其他国家出口总值为77925美元,从苏联、朝鲜进口了纺织品、钢材、车辆、军工产品、民用百货等大量生产生活物资。如《珲春市志》记述,1945年11月,珲春新政权建立,由共产党人担任县政府领导,组成珲春县贸易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1946年从朝鲜清津仍有商贸交易,购进化肥、明太鱼卵、粮食、食盐等生活物资。对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和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巨大作用。

4. 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经贸往来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来侵略势力被彻底驱逐,吉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商贸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据《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记载,吉林省对苏联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吉林省的经贸往来开始不断扩大,稳步增加。“一

五”计划期间,国家确定从苏联引进重点工程项目,吉林省就有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热电厂、长春客车厂等十多个项目。1956年以后,陆续建成投产,成为全省国民经济的骨干企业。吉林省同日本也有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1963年,省农机局从日本引进各种农业机械122台,在龙井市东盛乡进行水稻生产试验。“六五期间”,一汽和吉林市电冰箱厂分别从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了企业生产能力和年产值⁽⁹⁾。《珲春市志》载,1985年珲春外贸公司对朝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额达693.9万元(人民币)。同年与苏联哈桑区达成易货协议,中苏边贸开始复兴。1988年6月,吉林省政府批准珲春市外贸公司行使对苏联边境贸易权。虽然当年贸易额只有10多万元,但对苏联贸易的大门已打开,成为吉林省对外贸易的窗口之一。此后,俄罗斯逐渐成为吉林省境外投资的最大国别。吉林省对朝鲜的贸易品种也愈益丰富,如1985年珲春基本只从朝鲜进口单一的海产品、少量木材,出口也只有棉纺织品,1986年以后增加了粮油、土特产、饲料、五金、工业制品等⁽¹⁰⁾。吉林省外销市场不断扩大。“六五”期间,吉林省出口商品增加到1000多种,其中大豆、玉米、豆粕、园参、混合饲料作为拳头产品,五年累计出口4.9亿美元。1980-1985年,吉林省最大的外销市场为香港地区、日本与苏联。1985年,向日本出口金额为12208万美元,向苏联为9792万美元,向香港为12379万美元,合计占全年出口创汇总值的81%⁽¹¹⁾。

二、吉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互通

东北土著狩猎、游牧民族如满族和蒙古族的社会文化在长期建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加之汉民族拓荒者带来中原文化与之交通互融,在清建国前后 300 年吉林文化达到繁荣阶段。但由于清朝的东北封禁政策,吉林文化在世界近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仍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缓慢的发展态势。尽管如此,早期自发开展的对外经贸活动,近代地缘政治的剧烈变革与冲击,使吉林省的社会文化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带一路”国家影响。

在方志文献中,记述吉林省与朝鲜民间文化交流密切,相处融洽的史实屡见不鲜。如《长白汇征录·长白山江岗志略》中多有记载。“漫江营”一节中写到:“(此地)有韩民 30 余户,池边多膏腴之田,韩民亦皆富饶,故名为营。”描述了越垦朝民勤劳朴实,与边境汉民友好和睦相处的怡然图景。书中还记述一件轶事,作者刘建封在路途中见一牧童骑牛,手执一书,借过来一看,原来是《汉书》。经过询问得知此牧童姓许,年仅 15 岁^[12]。牧童一边牧牛一边读《汉书》,显示了朝鲜对教育的重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

随着与“一带一路”国家交往事务渐趋繁多和复杂,清末,清廷也开始着手培养外交人才。如《琿春市志》载,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副都统依克唐阿在琿春设立中俄书院,挑选琿春、宁古塔、三姓八旗子弟 15 人入院学习中俄文学,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拣派工部候补

主事毛鸿遇主持并兼俄文教习,专门培养中俄外交人才^[13]。

俄、日等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现代化媒介以强硬姿态输入东北社会。据《吉林省志》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俄国人在长春西三道街首演“电灯影戏”,电影从此传入长春。1920 年,日本人在长春经营“长春座”和“株式会社长春座”,长春始有专业影院(也兼演戏剧)^[14]。1932 年 3 月,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为了利用广播和电影等新媒介向东北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1933 年 4 月,成立“新京(长春)放送局”进行汉、日、朝、英、俄等多语种无线广播¹⁵;1937 年 8 月,伪满洲国设立“株式会社满州映画会社”,吉林开始出现电影故事片制作单位。1945 年日本战败,广播和电影事业的主导权最终回到中国人手中。

在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等方面,吉林省也受到“一带一路”国家影响。民众购买俄国商品,与俄商接触,也熟悉了一些俄语单词,并自然运用到生活当中。如“大列巴”(大面包)“布拉吉”(连衣裙),至今仍时有习用。日本的“注射器”“卫生”“健康”等许多日常口语词汇也成为东北的常用语。啤酒、面包、红肠等特色俄式食品成为东北民众饮食的一部分。朝鲜的泡菜、打糕,日本的寿司,蒙古的奶茶等在东北食品中也不少见。《吉林新志》载:“(旧式之毡鞋)自十七年(1928)冬,为哈尔滨、海拉尔等处俄人工厂所制之‘毡疙瘩’(形似靴)所夺,销路渐窘。”谈到建筑,该志记述:

“近年之建筑，都市民宅仍为旧式，惟新建筑之衙署、工厂、铁路、站房及新京（长春）之头道沟、日租界，哈埠之道里，则皆为西式。故入头道沟、哈埠道里，几疑其为西洋市街。”⁽¹⁶⁾至今，长春的俄人所建宽城子火车站、华俄道胜银行，日本修建伪满八大部，仍保留着昔日鲜明的异国特色，也昭示着当年东北曾被侵略、被掠夺，那段殖民统治的屈辱史。

但总体说来，吉林省的历史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出稳定的传承性，没有因外族侵略而变异变质，它的根系仍然顽强的保持了东北地方特色。东北沦陷时期，吉林省上层社会的礼仪接受了清代某些习俗及日本礼节。一些封建迷信陋俗得到提倡⁽¹⁷⁾。但抗战胜利后，这些硬性灌输的礼节和陋俗不复传续。

蒙古与中原及东北地域文化也始终处于互相交流和影响中。据《郭尔罗斯考略》记述，蒙古自古以来一直沿用十二兽名纪年。随着蒙古族进入中原，受汉文化影响，出现了汉文化的干支纪年与十二兽名纪年并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时外蒙尚未独立），清王朝强力推行“移民实边”，黄河流域大量贫困农民进入吉林、黑龙江和蒙古草原。喀喇沁、蒙古贞等卓索图盟的大批破产的蒙古族农牧民也进入嫩科尔沁和呼伦贝尔，出现了喀喇沁、蒙古贞文化北移⁽¹⁸⁾。

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组成部分，与苏联（1991年12月后为俄罗斯）、朝韩、日本、蒙古等“一带一路”国家开始正常交往互访，平等友好的文化交流一直持续

至今。

三、启示与思考

从方志文献的记载可看出，吉林省有很好的先天地理位置优势，又由于历史上民族融合、边贸交往的联系，与接壤各国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近现代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被侵略和剥削奴役的屈辱史，但其中也不乏各国民众之间自发、自愿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强求一致，经济掠夺与剥削，侵略和战争与人类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终将失败。国家间互相交往和共同繁荣的关键，在于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一带一路”战略恰好是实现共同繁荣的最佳途径。

吉林省虽然居于东北亚重要区位，但在地理上仍是一个“关中”，有一定的封闭性，因而更需要在“一带一路”的更大开放环境中实施振兴规划。吉林省“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区位——图们江口地区的发展，制约于历史的被动，也制约于多边博弈造成人工的一个“喉结”，打开这个喉结，还需要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交流的利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吉林省应依据开放需要，结合共同的利益点，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寻求“一带一路”建设的突破。

地方志的传播和研究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拥有翔实丰富、集

多少代多少人才的智慧荟萃而成的广阔资料,其所提供的历史借鉴与启发未来的智库作用是其它媒介不可替代的。目前吉林方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点,未来随着对方志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会不断挖掘出地方志服务于吉林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亮点。

注释:

- (1)《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3页。正文中所提同名志书均指此志。
- (2)《珲春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3页。正文中所提同名志书均指此志。
- (3)《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3-4页。
- (4)《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4页。
- (5)《长春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26-128页。正文中所提同名志书均指此志。
- (6)《满洲通志》,日文,守田利远编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辽宁图书馆馆藏。转引自《长春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29页。
- (7)《长春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33页。
- (8)《长春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78页。
- (9)《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8页。
- (10)《珲春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267-268页。
- (11)《吉林省志·对外经贸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12页。
- (12)《长白汇征录·长白山江岗志略》,清·张凤台,刘建封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第213,214页。
- (13)《珲春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311页。
- (14)《吉林省志·电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第1页。
- (15)《吉林省志·广播电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第13页。
- (16)《吉林新志》,1934年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第272,273页。
- (17)《吉林省志·民俗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第3页。
- (18)《郭尔罗斯考略》,王迅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第77页。蒙古贞文化:辽宁阜新境内的蒙古族在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中,部族之间相互融合,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相互交融,积淀了独特的蒙古族地域文化,即蒙古贞文化(因蒙古贞部落而得名)。